

張岱年文集

張岱年文集

第一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

张岱年

责任编辑 段传极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5/8 32K 插页 4 字数: 324 千字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50

精 ISBN 7-302-00429-3/B·3 定价: 7.50 元

平 ISBN 7-302-00438-2/B·4 定价: 4.50 元

冯友兰序

在20年代,中国哲学史界对于孔、老的年代问题有过一次大的辩论,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一派认为老先于孔,胡适先生主之;另一派认为孔先于老,梁任公先生主之。两派各执一辞,莫能相下。辩论之文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后又知其为张申府先生(崧年)之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张先生旋即与余之堂妹订婚,以学术上切磋之友谊,申以婚姻,益亲密矣。

余于1928年由燕京到清华,张先生已于是年毕业于师大一附中,同时被师大和清华录取。在清华上课月余,惟不习惯于当时清华之军事训练,又从清华退学回师大就读。清华亦不以为忤,毕业之后,仍按原计划聘为清华哲学系助教,并担任哲学概论课程。其时,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又非出自哲学专业,选课者除哲学系一年级生之外,亦有其他系高年级生,均翕服无闲言。盖张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重大问题“心知其意”。讲课者言之有物,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之谓也。“心知其意”则无妄。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无妄之效也;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亦无妄之效也。

张先生之学生有习篆刻者,欲治一闲章以相赠,请示印文,张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

闲章也！”张先生之本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矣。“近仁”之言，其意当哉！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学，二曰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中国哲学史界同人，收集张先生 50 余年来的重要论文和著作，编以为《文集》，命序于余。余谓张先生之学术主张已详书中，又何待序之赘言，以为蛇足乎？为张先生之为学与立身之道有尚未为世所注意者，故标而出之，以为书之引端。其“直道而行”乃张先生所自言；“修辞立其诚”乃余所窥测而得者，质之张先生以为然否？

抑有更进一义者，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概。“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诚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诚乃《中庸》之中心思想，故曰：“不诚无物”。又曰：“君子以诚之为贵”。有志者于此悟而力行之，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周易·乾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先生尝主此言以说明中国文化之精神。校之以《中庸》之意，“天行健”则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自强不息”则所谓“至诚无息也”。天之道出乎自然，人之道有待于有志者自勉之功夫。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亦“自强不息”、“至诚无息”之意，言晚节之难也。余虽不敏，愿与张先生共勉之。

马友声

1988 年 3 月 21 日

序于北京友谊医院时年九十有三

楚 图 南 序

读了张岱年先生的《孔子与中国文化》一文，印象很深。岱年先生这篇文章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是带概括总结性质的。岱年先生讲到，孔子思想影响很深远，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为核心；讲到孔子重视道德价值，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中国文化有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

长期以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有着极为光辉灿烂的内容。过去说，最早是北京猿人，约 50 万年以前；后来发现了元谋人遗迹，推到 170 万年以前。有文字的历史，过去从甲骨文算起，是 3,000 年，现在根据地下的新发现又推到 6,000 到 7,000 年。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与自然斗争，与生活斗争，积累经验，不断反思，提高了认识，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以后有汉学，经今文学，经古文学，以后又有宋学，程、朱、陆、王。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全面、丰富、历史悠久，且没有中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和中国相比。古代巴比伦文化和古代埃及文化已成陈迹，仅可供考古学者去探索。欧洲的希腊、罗马和亚洲的印度，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但在历史的进程中都曾遭到破坏而有中断。唯有中国文化不断延续下来，中国社会也不断发展。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创建发达的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学术事业和研究工作方面，即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全面观察、分析、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学说，得出正确的结论。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冯友兰、梁漱溟、钱穆，都提出了不少见解。但认识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现在可以排除门户之见，以科学的观察和论证，全面分析、深入研究。在这方面，岱年先生的工作做得很好。读罢他的文章，使我产生一些共鸣。

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主要是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中国也还有道家、墨家、法家思想，后来还有佛学等，但都不如孔子和儒家思想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和深远影响。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导力量。当然，孔子生长在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思想认识难免会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有着它局限性和片面性的一面（也可以说是落后和消极的一面），如：等级思想、宗族观念、男尊女卑、上下有别等等。由于这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加上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利用，甚至歪曲和过高地尊崇，强制性地要人民信奉，也使儒家思想的消极面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包袱，使中国文化停滞不前，不能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向前发展。

因此，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我们应去粗取精，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加以探讨。譬如仁和义，岱年先生认为是一个范畴的两个方面。我的看法，这是两个范畴的统一。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岱年先生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更高一点说，如孟子的所谓“浩然之气”，就是由此而来的。仁和义，是两个范畴的统一，两者都重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际关系的态度；义是讲社会公德，人与人，国与国的公正关系。齐桓公尊周室，存灭国，继绝世，孔子对此尚无微辞。但战国时候互相兼并杀伐又是另一回事了。《吕氏春秋·禁塞篇》最后有两句话称“大乱天下者在于不论其义”，我认为这也可以说是儒家关于义的一种阐发。到

了汉代,《礼记·礼运》篇更将这种思想发展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在做人的态度和风格方面,不以其道不取,不食嗟来之食,更不为五斗米折腰。如朱自清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这种中国知识分子重气节,明义利,以及爱国爱民,先忧后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深思、研究,甚至加以继承和发扬。

一个仁,一个义,创自孔子,后来的子思和孟子续有发展,并贯彻到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维持了民族的继续和前进,维持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影响。我看了老舍的《四世同堂》电视剧,并听了那支高昂、悲愤、慷慨的主题歌,曾写了两句诗,“皇皇华夏国魂在,历尽颠危永不摧”。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多少战乱,多少灾祸,但中华民族却保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思想也曾征服或同化了侵入中国、文化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远的如南北朝时代的拓拔魏,近的如蒙古、满人。当然,如能汲取和融化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但不是低级趣味、没落腐朽的糟粕),进一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提高中国文化的水平,如汉唐时代吸收中亚文化和南亚的印度文化那样;同时也借他山之石、攻磨自己的缺点,既要排除儒家思想的消极面,更要清除封建文化的残渣余孽,那就也会影响全世界和全人类。

我从建国初期,50年代以来,以工作关系曾访问了欧、亚、非、拉美许多国家,接触到不少学者和朋友。在国内也曾接待过不少外宾,其中有许多是文化学术界的人士。记得有一位法国朋友说: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发达,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但却缺少了文化,真正的文化乃是在中国。北欧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也曾谈到,一个人不到中国等于没有到世界,不懂中国文化等于没有文化。此事我曾向周总理反映过,后来邀请他到中国访问。在亚洲,一位印度朋友说,佛教发源于印度,但现在大乘教却在中国,最完整的佛经也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佛学也只是在中国才得到发

展。在日本京都，一位知名的学者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群众集会上说，中国文化乃是日本文化的母亲。这些交谈当然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但也不能说是随便应酬的、言不由衷之论。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旅游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多了。中国有了完整的和比较准确的英文和法文《红楼梦》译本介绍到西方，有人甚至将曹雪芹比之于英国的莎士比亚。更不用说中国的中医、中药，乃至戏剧、音乐、气功、武术和围棋、技艺之类也逐渐地引起各国人民的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他以数十年的辛勤努力和深入研究，写下了七大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介绍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乃至中国的天文、地理、医卜、星象对西方的影响和对人类的贡献，这更是人所熟知的。

所以，中国文化思想包括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史文物载籍，不仅仅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也将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中华民族，即我们炎黄子孙对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学术技艺有足够的认识，做足够的努力，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使中国不仅是文化发达的古国，也是文化新兴的大国，既维护和发展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也包融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对人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我想这当不会是我个人的痴望和空想吧。

但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西方文化思想、西方科学技术的挑战，更不要说近百年来我们遭到了多少难以忘怀的侵略和压迫，屈辱和灾难，使中国沦陷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态度，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不求进步、不求发展，是错误的；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亦是错误的。死守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一切清规戒律以及所谓的礼法制度，不求振奋，不求突破和前进，是错误的；认为民主、自由乃至人道主义都是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范畴，不敢或不屑大胆地吸收和融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错误的。

我们在实际工作和战略部署中，既要关心国民经济的贫穷落后，力求摆脱，全力搞好经济建设，也要关心精神文明的落后。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基础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建设工作重视不够，加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破坏，人民的文化素质乃至道德品质越来越赶不上时代的需要，更不要说与我们文化古国的美名极不相称。这就要求我们十分认真地重视教育、科技、文化工作。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是为浅见，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是为无知。两者必须齐头并进，始能建国兴邦，四化建设才有希望。我们要有这样高度的认识和恢宏的气概，兼包并蓄，集思广益，不断进步，不断创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思想（当然也包括“五四运动”时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内），不断地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容，发展和提高中国文化思想的水平，加强和改善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成为有高度文化、高度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大国，并努力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社会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贡献，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造福人民，造福未来。

我因多年来学殖荒废，虽有时也抽空看一些书刊和杂志，但所知有限，既不深入，也不全面，承岱年先生和几位青年同志亲临寒舍，谈及此事，因略抒鄙见如上。适值清华的同志们编辑岱年先生文集，约我作序，乃以此文付之，权作弁言。

楚图南口述，钱逊记录整理

1988年2月24日

张岱年文集

自序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刘桂生、刘鄂培、羊涤生、钱逊等同志建议编辑我的文集，我既感且愧。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几位学人的文集，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全集》，朱光潜先生在世时也出版了几卷《朱光潜文集》，至于当代文学家的文集更是琳琅满目。这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具体表现，当然是值得赞许的。至于编次我的文集，我虽然自视歉然，却也不敢违背挚友们的盛情雅意，于是就记忆所及，将30年代以来所写论著列出简目，请鄂培同志等略加选择。这不过是保存3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园地中一隅的踪迹而已。

30年代之初，我开始发表言论，当时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二是关于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我比较注意阐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与唯物论哲学；在哲学理论方面，我比较注意外界实在问题与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主观唯心主义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一部分实证论者又认为外界实在是无意义的，我尝试从理论上加以辩驳。唯理论者认为共相潜在，即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自存，我也不以为然。当时著论研讨这类问题。此外对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则以及人生理想，也都有所论述。对于文化问题尤感兴趣，参加了30年代的文化讨论，著文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这是我关于文化问题的一贯观点。

今将1931年至36年所撰写的杂论编为第一卷；将1936年所

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列为第二卷；将40年代所写的《哲学思惟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等列入第三卷；将50年代所写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编为第四卷。50年代末至70年代后期主要从事于中国哲学史资料的编选注释工作，无足存录者，70年代末又有所撰述。将70年代末到80年代所著编为第五卷及第六卷。今我年届耄耋，赖挚友之助，编定此集，心中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文集所收都是我亲自撰写的，近年来有时也请二三少壮同志执笔著文共同署名发表，这些一概不收入此集。

承蒙前辈冯友兰先生、楚图南先生为拙集撰写序文，非常感谢！最先提议编辑拙集的是钱耕森同志，范学德同志也协助编辑工作。刘鄂培同志和范学德、刘晓峰、崔永东等同志在图书馆所藏旧杂志中查找我的旧文，十分辛劳，盛情尤为可感！承清华大学出版社将此集列入出版规划，使此集得以问世。谨向参加编辑工作的刘鄂培（第一卷）、钱逊（第二卷）、羊涤生（第三卷）、刘晓峰（第四卷）、崔永东（第五卷）、李春平（第六卷）等同志及参加编抄的年轻同志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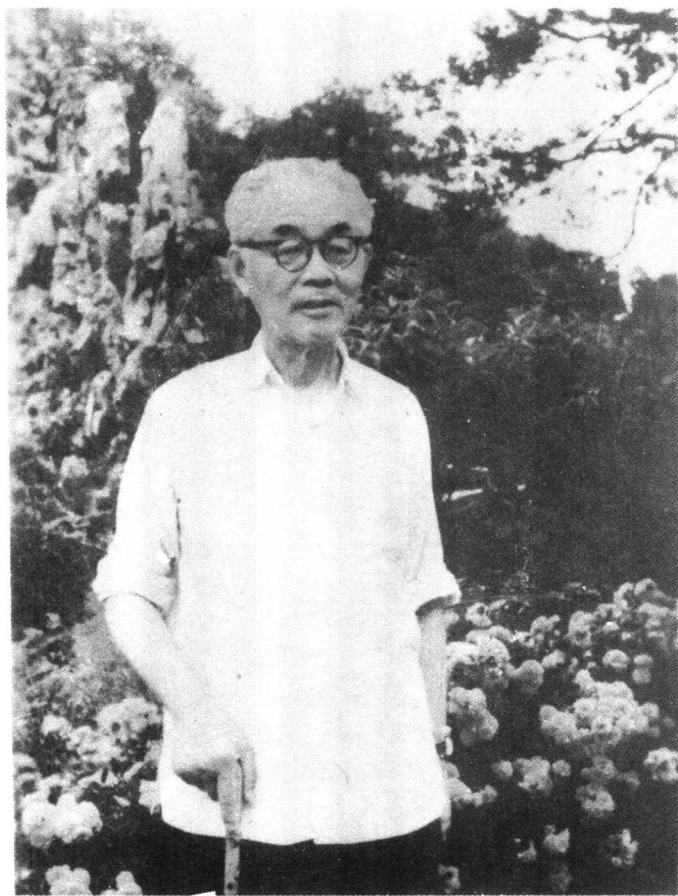
1988年3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张岱年文集》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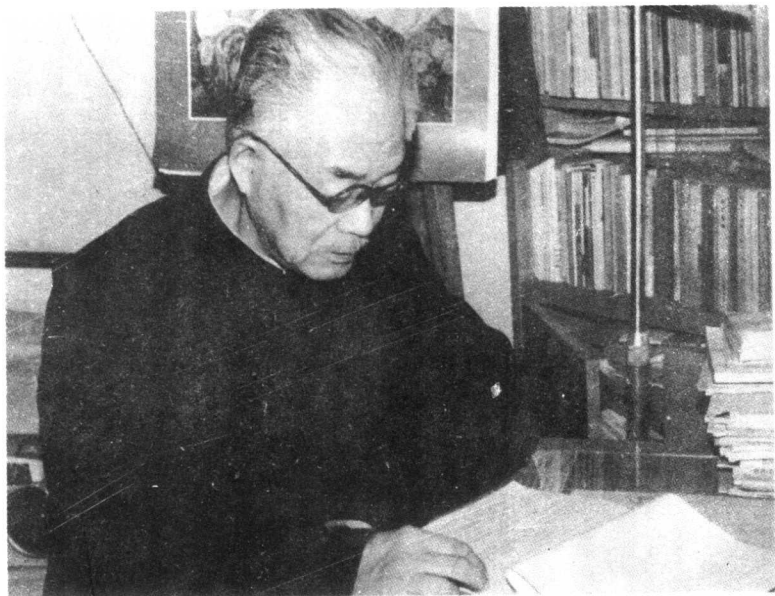
主 编：刘鄂培

编 委（按姓氏笔划）：

刘鄂培	刘晓峰	羊涤生	李春平
范学德	钱 逊	钱耕森	崔永东



張岱年



张岱年先生工作近照

一九八八年三月摄于北京大学寓所

张岱年文集

第一卷

目 录

作者照片	
作者手迹	
冯友兰序	i
楚图南序	iii
自序	ix

第 一 编

论外界的实在	3
谭“理”	11
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	22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	33
哲学的前途	43

爱智丛谈

爱智	49
“问题”	52
辩证法与生活	55
辩证法的一贯	60
知识论与客观方法	65
相反与矛盾	69
破“唯我论”	73

辟“万物一体”	76
道德之变与常	78
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	81

第 二 编

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	87
老子补笺	106
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	120
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	129
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	
——“本根”概念之解析	141
中国哲学中之非本体派	146
颜李之学	
——李恕谷逝世二百年纪念	150
中国思想源流	156
中国知论大要	162

第 三 编

关于新唯物论	187
生活理想之四原则	194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204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210
维也纳派的物理主义	227
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	232
逻辑解析	234
斯辟诺萨	239
斯辟诺萨与庄子	24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	250